



弯刀 #1

弯刀

弯刀
弯刀 #1
2008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various-authors-articles-from-machete-1>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2008

目录

弯刀	3
个人还是公民?	5
实践	6
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	8
误解	11
《全国团结互助公约》摘录	15
你把这叫生活?	16
安全如死	18
自由万岁	25
如何停止工作的十个技巧	27
诚实的劳动者	30
邦诺和福音派	32
打倒工作!	34
非法分子, 而不是传教士	36
既不是奴隶也不是主人 (没有奴隶就没有主人)	37
一个历史学家的错误经历	39
在最后	41
非法主义者	43
大自然吞噬了进步并超越了它	44

弯刀

弯刀是一把单刃的长刀，特别是当你发现自己被敌对的环境所包围时，用来开路，使你无法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使所有的行动瘫痪。弯刀并不优雅；它没有匕首的谨慎，也没有手术刀的精确。当它攻击时，它不区分无辜的花朵和有毒的杂草，它不加区分地摧毁两者。弯刀很重，携带起来不舒服，但在困难的情况下，当没有时间进行科学计算、探索性侦察、外交磋商时，弯刀可以证明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有必要，它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进攻工具使用。然后—据说—它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的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杂志的标题。因为我们的指南针—同时是理性的、感性的和内脏的—继续为我们指出要走的路，但在我们周围，我们察觉到越来越高、越来越厚、越来越危险的障碍。我们无意回头（用我们的冒险梦想换取更舒适、更有组织的航行，走向某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不想让自己在一个集体的临时营地中适应天体的生存（甚至同时融入环境），不相信对更有利的条件的期望（通过每天重复的赎罪仪式的结果），留给我们的只有继续前进。继续下去，不顾一切，反对一切。放弃这一点将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没有一天不感到自己被现实主义所控制，被政治所束缚，被激进主义所感染。我们因缺乏空气、幻想和游戏而窒息—而我们这种形式的呼吸不耐烦需要乌托邦，未来的氧气将鼻子从现在的臭味中解放出来。

握着弯刀，整齐地切开所有的方便，我们将试图在这个肮脏的好感中变得巨大，它想把我们卷入其平庸的漩涡，由公正的民主和中立的技术、道德的市场和战术的联盟、尊重的传统和容忍的敌人组成。我们不会放弃不敬、亵渎和标志性的愤怒，今天，就像昨天和明天一样，我们对这个基于自愿奴役和令人厌恶的统治的世界投以不敬的目光。我们想把这个世界带向毁灭，而不是带向一个更明智的管理。

弯刀……并不打算以其专业性成为一个反对性对抗的容器，因此它将不会举办公报、传单、宣言。已经有讲义、公告、博客等等，或多或少地实时提供了这种仍然必要的功能。现在缺少的是煽起批评的烈火，准备讽刺的腐蚀剂，以及-为什么不-练习论战的顽强吃人的地方。

为了实现这个无赖的目标，我们将利用许多确定性和常识性的破坏者的合作。他们可能是有名的或无名的，来自现在或过去。我们将毫无顾忌地掠夺他们的理论武器，告诉他们的名字，但不说明他们的贡献。因此，这些文章都将是严格意义上的匿名的。

因此，混淆了如此多的崇拜和偏见的实践者的道路，《弯刀》不是运动的任何领域的喉舌，任何潮流的机关，任何团体的公告。它是少数特定个人的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和那些与这个世界达成协议的人感到愤怒，他们可以与其他特定个人分享。它的印刷量将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不会隐瞒-目前这种工具所能唤起的兴趣是有限的。但幸运的是，一个行为，任何行为的影响和后果，都可以逃避所有的统计和列举。

森林在斧头和炸药面前倒下了，但在两个铁路交叉口之间，它把自己扔在了铁轨上，用挑逗的手势和诱人的目光向火车的工程师讲话。有一次，两次，他将抵制诱惑，这些诱惑将沿着整个路线跟随他，从一个青翠的铁路领带到一个被一群蜜蜂隐藏的信号，但有一天，他将听到这个有着心爱女人模样的女魔头的召唤。发动机会因为他顺便渴望的一个拥抱而停下来，但这个拥抱会根据女妖的永久更新的欲望而无休止地延长。虽然是哑巴，但女妖仍然知道如何把她的受害者无可挽回地引向不归路的深渊。

因此，缓慢的吸收开始了：活塞杆接着活塞杆，杠杆接着杠杆，火车头回到了森林的床上，从妖艳到妖艳，它湿润了，颤抖了，像发情的母狮一样呻吟。它使兰花变黑，它的锅炉给前一天开花的鳄鱼的玩物提供庇护，而小鸟军团住在哨声中，给它一个嵌合的和暂时的生命，因为相当快的森林的火焰将吞噬它，就像一个牡蛎在舔了这么久的猎物之后。

在远处，缓慢的树木摩天大楼将竖立起来，表达一个不可能收集的挑战。

[本杰明-佩雷特]

大自然吞噬了进步并超越了它

正午的阳光把那些无法及时躲藏的幽灵活活晒死。他们的骨头变成了小提琴，在迷失在森林中的冒险者的耳边嘎嘎作响，模仿着罗马皇帝的颓废宫廷。

火舌、乳房的闪光、蓝色的反射穿过充满吸血鬼的半光。人们几乎无法行走。地面上有一种希望以海绵的形式出现的大脑的气息。沉默重重地压在耳朵上，就像手上的金块，但金子比橘子还软。然而，这个人来自那一边。他在绿色中开辟了一条走廊，沿着这条走廊，他拉起了一条电报线。但森林很快就厌倦了拥抱这根除了人的声音之外什么都不回馈的电线，而植物，成千上万的植物，比其他的植物更热情，更贪得无厌，纷纷赶来把这个声音扼杀在它们的吻下；然后沉默又落在森林的上空，像一个救援的降落伞。

在那里，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死亡只是生命的一种临时存在方式，它掩盖了棱镜的一面，使光线集中在它的其他面上，更加辉煌。

反鸟动物的头骨在大树之间提供掩护，这些大树受到数以千计的爬山虎藤蔓的威胁，鸟儿的巢穴在它们的翅膀上反射着阳光，在它们的喉咙上反射着树叶。蓝天的斑点在尸体上跳动，蜕变成一丘丘的蝴蝶。

生命在其所有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地战斗，以水面上成群的蚊子为标志。生命的爱与杀戮，用杀人的手抚摸它所爱慕的东西。种子像绊脚石一样发芽，无情地将吞噬它们的蚂蚁钉在地上，它们的可怕的发芽能力也可能归功于此。鲜血唤回了呜咽的花朵，而花朵的杀伤力比手枪还要大。它们杀死了手枪。

在创世纪还没有说出它的最后一句话的地方，在那里，土只是从水中分离出来，在空气中产生火，土和水，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赤道的美洲，土和水在天火的恐吓下，日夜交欢，步枪赶走了它没有杀死的鸟，蛇把步枪像兔子一样压死。

个人还是公民？

” [没有世界的人] 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些被迫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的人，(…) 在一个他们存在的世界里，根据他们的条件被考虑和使用，但其模式、目标、语言和品味仍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也没有授予他们。”

- 贡特-安德斯

没有世界的个人，我们与自己独处。我们的批评家在我们微薄的成果面前摇头，责骂我们缺乏意愿。但最终，让我们承认，人们会感到厌烦。难道就没有一些小地方也适合我们吗？如果许多人认为极端主义是一种幼稚的疾病，那是由于这种平庸：只有在年轻时，我们才觉得有能力拒绝世界，拒绝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当我们充满力量，整个未来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什么都不怕，既不怕警察的指控，也不怕在星空下睡觉，所以更不怕，不屑于妥协。在这个永恒的童年里，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而且触手可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拒绝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生存的簿记员。我们热情地爱，我们愤怒地恨。如果这种热情，这种对自己的骄傲的爱，会使我们被孤独放逐，那就这样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东西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事情被干预了。能量用完了，库存减少了，弹药缺乏了，我们注意到我们在面对未来剩下的东西时，可触及的东西很少。

同时，社会的冬天在前进，用冰霜覆盖大地。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提出一个补救措施。那么呆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就不那么舒服了；也许有时心会暖和起来，而不是骨头。社区甚至会成为一个治疗的地方，治疗和消除”偏差”，但其中的那种乏味，有保障的饭菜，干燥的床铺！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以几乎不被注意的运动，我们接近了政体。如果早先这个世界不能指望我们的同情，如果早先它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敌意，那么现在它可以依靠我们的理解：批判的目光已经让位给迷恋的目光，尖刻的话语已经被劝说的话语所取

代。而一旦进入政体，就必须丢掉所有的旧习惯，获得新习惯。社区生活需要尊重时间表和良好的礼节。如果一个人想被容忍，就必须知道如何容忍。避免可能激起公愤的行为，在他人不受欢迎的行为面前闭上眼睛，变得不可或缺。”做的人永远是对的”，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说法。这就像坚持认为”说话的人总是对的”。所看重的不是运动或说话的内在质量，而是它们的单纯存在。然而，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沉默却被揭示为黄金：保持沉默比让自己在无休止的、愚蠢的胡言乱语中继续下去更好。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一个人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要如此焦急？为什么要献身于行动主义，献身于这种强制性的行动，献身于这种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动员，它确实填补了我们存在的空虚，但却没有赋予它一种我们自己的、自主的、带有差异性的、独特的、站在每一个真正行动的原点上的意义？

事实上，在哲学的迷雾之外，有一种对”创造性的无”的恐惧，在其中我们看不到达到我们的充实的机会，而只是看到一头栽进虚空的承诺。最好是相信事情的紧迫性的永久运动，在那里没有时间思考目的，因为有必要考虑如何组织手段。乌托邦是美丽的，但它真的不实用。

实践

在法国，它被称为”公民主义”，这个词表明了一个由协会、联盟、集体、新闻机构和政治潮流组成的庞大而多形式的群岛运动，其目的是为恢复”被背叛的民主”而奋斗。从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球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事实现在对任何人都没有隐瞒。公民主义者将这种情况的原因追溯到对”民意”的不尊重，一旦它落入只渴望权力的政客手中，与只贪图利益的商人勾结，就会被漠视、被操纵、被否定。

公民主义者是这些政客和商人的敌人（而不是他们只是表达的社会制度的敌人），他们相信民主-在其最真实、最粗糙的形式下-实际上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通过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明显危害和滥用，有可能改善和道德化它们。但有两个条件：这种民主是通过政治重生来表达的，这种重生更多的是仿效伯里克利

非法主义者

革命者是最最终的非法主义者。一个行动总是符合法律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将是一头被驯化的野兽，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法律可以保存，革命可以再生。

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就必须从违反法律开始。

声称在尊重法律的同时可以进行革命是一种反常，一种矛盾。法律是一种枷锁，任何想获得自由的人都必须打破它。

任何以通过法律手段解放无产阶级来欺骗工人的人都是骗子，因为法律禁止从掠夺我们的主子手中抢夺财富。征用他们的财富以造福所有人，是人类解放的基本条件。

法律是一个刹车，我们不会用刹车来解放自己。

人类所征服的每一种自由都是非法分子的杰作，他们掌握了法律，以便把它们砸成碎片。

暴君死了，被刺死了，法律条文中没有任何一条能摆脱他们。

征用只能通过破坏法律来实现，当然不能通过服从法律来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成为革命者，就必须成为非法主义者的真正原因。我们有必要脱离常规的道路，开辟新的越轨之路。

反叛和合法是不可调和的。把法律和秩序留给保守派和骗子吧。

[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

地威胁着人类的单纯生存，当我们在四面八方看到富人尊重穷人的苦难，穷人尊重富人的富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仍然有消防员以革命的名义，但实际上是代表他们平静的生活，赶去扑灭非法主义的火。激进主义的传教士们对宁静的呼唤是否能阻止社会战争的紧迫性？

的雅典，而不是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或者是公民更多的直接参与，他们不应该只是选举他们的代表，还应该不断采取行动对他们施加压力，使他们真正坚持他们被选举的事情。这种压力可以以最多样的方式进行，包括那些让最粗鲁的反动派吐出毒液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这些行为在运动中引起了人们的敬佩。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公民主义是由失望产生的。在其最具改革性的变体中，是对那些被送入宫中的人与留在街头的人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感到失望。有许多受人尊敬的人—说白了，就是那些相信是权力创造和保障了自由，市场应该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或者军队应该尊重道德准则的人—不再觉得他们被一个统治阶级所代表，这个阶级被公开指责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对老百姓的利益充耳不闻，只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些可敬的人坚信国家，相信国家的必要性，相信国家的有用性，相信国家固有的公正性，但他们对国家暂时感到失望，认为今天的国家并不是由有能力的、诚实的、正直的、忠诚的政治家指导的。这是他们对职业政治家、政党或工会不信任的来源，同时仍不放弃寻找能满足他们最高要求的人。

由于感到被忽视，公民主义者发现他们不得不走到街上去捍卫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斗争总是有精确的目标，仅限于对危害他们健康的特定国家项目说”不”，而丝毫不想对产生这种项目的社会组织提出质疑。他们并不关心激进的时刻，颠覆性的紧张。他们是诚实的公民，不是”流氓”或”恐怖分子”。不言而喻，尽管他们准备进行正式的非违法行为，如封锁街道，但他们被宣布为暴力的敌人。他们不支持镇压的防暴警察的警棍，也不支持起义的反叛者的破坏行为。他们唯一接受的武力行为是有控制的、最低限度的、综合的武力行为，他们偶尔会实施这些行为，以引起对手，或者说当局的注意。这些武力行动有时甚至可以是相当壮观的，但这并不妨碍实施这些行动的人在将来参与总统选举的竞争。在其不太改革的变体中，公民主义是对革命失望的结果，而革命的历史项目已被揭示为破产。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在其原则中，这一项目旨在由无产阶级重新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被视为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这些财富却被资产阶级独享；无产阶级的播种努力，资产阶级的收获成果。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变革只能被认为是对篡夺阶级的单纯压制。因此，生产力

的扩张被看作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步骤，与真正的运动一起进行，通过这个运动，无产阶级被构成为未来的革命主体，实现了共产主义和无治状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俄国、德国和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这种观点的破产开始暴露出来。最后的冲击是1968年的法国五月，它开启了另一个痛苦冲突的十年。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对天堂的最后一次伟大攻击，标志着这一社会解放项目不可挽回的衰落和消失，与此同时，资本的重组，通过引进自动化，确立了工厂的中心地位和与之相关的神话的结束。无产阶级革命的孤儿们在公民主义中找到了一种抗议的形式，可以安慰他们的哀伤。其中流传的一些观念，如关于“财富再分配”的观念，直接来自旧的工人运动，他们计划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些概念中，人们可以看到公民主义对以前理想的回归、延续甚至劫持”。这就是所谓的“安排遗体的艺术”。

不管是资产阶级的开明成员要求公共事务更加透明，还是失望的无产者想要填补柏林墙倒塌后留下的空白，事实是，公民主义者没有能力拥有独特的思想，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另一个国家是可能的。如果在这片广阔的云层中，能够找到如此多的思想，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那是因为公民主义表达了一种综合的抗议形式，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公民参与，使经济体系的故障恢复平衡或重新调整其漂移。通过这种方式，公民主义设法跨越党派界限，使抗议和合作保持一致。抗议刺激了合作；合作满足了抗议。这解释了它的成功和它肯定的未来。它是唯一的调解方式，允许你通过与机构达成协议，立即获得“胜利”，无论多么局部。

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

在意大利，公民主义在 Val Susa 迈出了第一步，反对高速列车 (TAV) 的斗争。说实话，在皮埃蒙特山谷反对 TAV 的斗争是在十多年前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即对最早的建筑工地进行一些破坏行为。小小的行动引起了报纸的关注，逮捕了那些被认为是责任人的人，即三个无治主义者，后来证明与事件无关。在调查过程中，其中两个人自杀了。这些事件在当时引起的喧嚣，众所周知，我们不需要再赘述，引起了人们对 Val Susa 的国家项目的关

别官员；3) 唯一的平民受害者是企业的送货员，他帮助警察把炸弹运到警察局。

Evangelisti 在 Libertad 和 Pouget 之间所做的对比也很有趣。前者是一个非法主义者，后者是一个无治主义者；当普吉特的思想被描述为“更加平衡”时，真是令人惊讶。人们会问，伊万杰里斯蒂是否读过普吉特的论文《le Père Peinard》。这是一位当代人在1905年写的关于这份无治主义报纸的文章，它是工人阶级中拥有最多读者的最卑鄙的报纸。”没有任何哲学的展示（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它公开地玩弄无产阶级的胃口、偏见和愤怒。它毫无保留或欺骗地煽动偷窃、造假、拒收税款和租金、谋杀和纵火。它建议立即暗杀议会成员、参议员、法官、牧师和军官。它号召失业工人在任何地方为自己和家人获取食物，在春雨洗脚时在鞋店为自己提供鞋子，在冬风吹袭时在服装店也这样做。它号召工人们把他们暴虐的雇主赶出门外，把工厂占为己有；农场工人和葡萄种植者占有农场和葡萄园，把他们的主人变成肥料；矿工们占有矿井，当他们表示愿意作为同志式的朋友工作时，就把镐头献给股民，否则就把他们扔进闲置的矿井；应征者不服兵役而移民，士兵开小差或枪杀他们的军官。它赞扬偷猎者和其他违反法律的人。它讲述了旧时代的强盗和逃犯的事迹，并劝说同时代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如果今天还有这样平衡的无治主义者就好了。

至于被认为体现了“非法主义理想”以至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产阶级，要想知道这种假设有多么可鄙，只需回顾一下，在法国，无治主义干预者（那些支持无治主义者参加战争的人）既不是非法主义者也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恰恰是像让-格雷夫这样的无治主义偏执者。只有那些热爱群众，以至于追随他们并为他们的每一个卑劣行为辩护的人，才会接受支持战争的想法。利伯塔德和邦诺最大的批评者是坚持认为无治主义者可以是士兵，但不能是强盗。看哪，传教士的双重标准。

在最后

近一个世纪后，那些遥远的无治主义者的反抗仍在继续燃烧。当自愿的奴役达到60多亿，当社会、技术和环境灾难每天都在更多

是无治主义者对”犯罪”的热爱者。但稍后，我们看到，”甚至施蒂尔纳也不能被认为是非法主义者的启发者”。那么，关于非法主义思想有什么可说的呢？它们是一个”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论库”，还是形成一个”有限的理论库”？

为了在个人主义和非法主义思想周围创造一个无人区，伊万杰利斯蒂发现除了呼吁无治主义运动的大人物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他回顾说，”在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或同时代的马拉特斯塔和雷克卢斯身上找不到类似的东西”。仿佛在说，面对这些开国元勋，这些不法分子根本就不会是真正的无治主义者！然而，正是蒲鲁东在宣布财产是盗窃的同时，为个人报复的概念奠定了基础。那么，巴枯宁所提到的对邪恶激情的解禁呢？克鲁泡特金理论上认为有必要在雪地里播种，但也认为”除了合法性，一切都对我们有利”。至于”当代”雷克卢斯，他坚持认为”最终的懦弱是对法律的尊重”，并对拉瓦乔尔有这样的评价：”我钦佩他的勇气，他的善良，他的伟大精神……。我知道很少有人能在高贵方面超过他……。他是一个不寻常的慷慨的英雄”（而侄子保罗断言，”在目前的社会中，盗窃和工作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反对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诚实的谋生方式，即工作；而有一种不诚实的方式，即盗窃或欺诈……。”）此外，当人们知道另一位”当代”马拉特斯塔欣赏他，以至于问道：”为什么阿曼德不断地谈论‘无治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一个独特的学说体系，而通常他只是提出了任何倾向的所有无治主义者的共同原则，那么对阿曼德（除其他外，最坦率的非法主义者）如此激动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这还不够，这位博洛尼亚的幻想作家实际上还设法把无治主义者雷蒙-卡列明和形势主义者居伊-德波混为一谈！他在这里插入：”无治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这里，他插入了”也许这不是偶然的，1912年，儒勒-博诺的得力助手雷蒙-拉-科学在一首讽刺性的民谣中赞扬了亨利的另一项努力，即对卡尔马的采矿办公室的攻击，将该行为的平民受害者描述为 poulets vulgaires。”在这里，历史学家伊万格里斯蒂犯了一个历史错误，他尽力而为：1) 这首讽刺民谣是德波写的，他开玩笑地在上面签上了邦诺的”得力助手”的名字（有些人忍不住要用等级来思考……）；2) poulets vulgaires 的意思是粗俗的警察，是指当地警察和死于爆炸的低级

注。这催生了一场抗议运动—尽管它得到了相当多的同情—在几年内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局限于激进的环境中。但从2005年11月开始，当TAV线路的真正工作开始时，这场运动成功地打破了堤坝，具有了群众性。在Val Susa发生的事情激起了普遍的热情，使许多人认为他们终于发现了神奇的公式，只需在其他情况下重复就能获得同样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委员会、集会、反对”有害性”的民众倡议的传播，这些都充满了整个意大利运动的议程。但是，在所有这些在2006年7月被协调成《团结互助公约》的肆无忌惮的行动主义背后是什么？主要的话语是创造一个”新的”和”真正的”民主，也就是公民主义的话语。《公约》被许多人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文本，但它的文本是一个政治文件的完美例子，其特点是那些为了满足所有口味而在每个阵营都有一只脚的人的模棱两可（如果看到这么多公民在机构之外迈出了一步，只能给我们带来快乐，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为了团结而踏入机构的叛逆者呢）。有一些无治主义者在读到”《全国团结互助条约》当然不是企图隐蔽地渗入宫廷政治，也不打算在政治的宫殿里得到主持。它没有可以信任的友好政府。它没有任何政党可以给它一个空白的代表团，它当然也不打算走一条会导致它自己成为一部分的道路。”而没有注意到，这只是肯定了公民主义的跨党派和游说者的性质。公民主义者是平衡的人，他们不想成为一个政党，而是想给政党带来某种压力。他们很清楚，在政治舞台上的争斗是不能免除不愉快的后果的。而避免这种风险的方法是采取压力集团的形式，注意不直接行使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提出”白板代表团”，因为他们不想与少数受宠的人交谈。任何听从他们的人都可能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紧接着指出，《公约》”并不因此而回避政治和对抗，并且能够区分那些透明运作的人和那些试图遏制斗争的人。它所提出的模式同时也是它愿意接受的唯一方法；即公民的积极参与”。事实上，公民主义者并不回避政治，一点也不；他们只是不再想被取笑：明确的理解……他们远不支持弃权主义，而是宣扬参与。因此，如果Val Susa的反TAV抗议活动显然仍然过于扎根于旧世界，如果在与秩序力量发生冲突并破坏了Venaus的未出生的建筑工地（这个破裂的时刻后来在支持Val Susa的叙述中消失了，他们更愿意停留在更容易出现的人民大会上）之后，这种抗议活动后来流向了投票箱，上次选举中那里的投票站记录的高投票率看到了最在

的左派的胜利，这并不是偶然。因此，冲突和路障（目前？）并没有助长对所有政党的反抗，而是有利于其中一些政党。

如果说瓦尔苏萨的大量颠覆分子的存在给反对派带来了特别活泼的色彩，那么其他地方的斗争似乎大多是由格里洛男孩的胡言乱语滋养出来的。¹ 例如，在维琴察，反对美国军事基地扩张的斗争正在进行。反对莫林委员会明确表示，他们要求“尊重联盟²计划”，并站出来反对“从环境角度来看，该项目违反了我们的 2003/35/CE 条例已经承认的指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变革，肯定一个新的替代项目来捍卫集体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他们作为有抱负的治理者的性质，导致他们在“AltroComune”[“其他城市”-英译者]的旗帜下发起他们的倡议。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些委员会自称是反对美军基地斗争的唯一合法代表，将去年 4 月对基地实施的一些破坏行为的肇事者逐出教会，这并不奇怪。与这些行为保持距离显然是不够的。任何有机构血统的人渣被邀请到他们的付费营地以民主的名义胡说八道也不奇怪。更不用说，如果在定期举行的抗议游行中，像去年 12 月 15 日 [2007 年] 的游行，他们扮演消防员的角色，来公开阻挠那些打算破坏预期步行的示威者，人们会感到愤慨。令人震惊的是，在维持了“反对莫林委员会”（有法院注册的商标!），发表了他们的倡议，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并在“反对莫林委员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莫林委员会”。在维持了“反对莫林”委员会（有法院注册的商标!），发表了他们的倡议，表达了他们的声援，传播了他们的口号之后-显然对自主干预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是一场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而不是“反对莫林”的斗争，后者只是更大斗争的改良主义表达-希望在他们的目标方面引起突然的激进”转向”（其中包括对暂停的要求，其原则在运动中正是由《团结和互助公约》来评价的，下文将翻译其中的一部分）。

¹ 格里洛男孩与迈克尔·摩尔相似——英译者

² 共产主义革命党分裂前的意大利民主党旧称——英译者

实不谈，它纯粹是新闻界的发明，这些无治主义者是谁？邦诺曾做过很多工作，经常因为不容忍主人而被解雇。加尼埃是个逃避征兵的人，是个参加过多次罢工的工人，在罢工期间有违法和煽动杀人的记录，并且有工会证。卡勒明已经有盗窃和在大罢工期间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前科。Valet 是一名铁匠，总是出现在示威活动中。迪厄多纳是个木匠，曾参加过几次罢工。苏迪 (Soudy) 是一名杂货商，有犯罪史，在一次罢工中因散发传单而拒捕。DeBoe 是一名印刷工人，曾因一些反军国主义的文章被监禁。卡鲁伊在一家修车厂工作。梅奇 (Medge) 也是一名逃避征兵的人，他是一名厨师。他们都是普通的无产者，在当时的运动中很活跃，以各种方式合作出版颠覆性出版物，经常出入无治主义场所，参加与警察的冲突，如悲剧周之后的事件或 Liabeuf 的处决。他们都是同志，作为煽动者和头脑发热者被列入黑名单。由于这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找工作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个人报复的做法并不令人惊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遇到了不太愉快的”不幸”，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个人的选择完全符合无治主义思想，是臭名昭著的。

一个历史学家的错误经历

历史学家伊万杰斯蒂能做的，就是骑上他的高头大马去讲课。因此，通过阅读他的文章，人们得到了许多有趣的、虽然常常是矛盾的、有时是完全荒谬的东西的指导。

已经不明白方托马斯与非法分子有什么关系了。首先，如果”谋杀，而不是偷窃，是他犯罪活动的轴心”，相反，偷窃是非法分子活动的轴心，谋杀只是有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是否可以避免，这是另一个问题）。第二，如果”Bonnot 的人”（原文如此）”在”Fantômas 见光后几个月出现，他们到底是如何启发他的？那么，这些无治主义的非法分子是谁，他们应该充斥着报纸，”塞满”了他们的劣迹，激起了 Allain 和 Souvestre 的幻想？

然后，像往常一样，还有麦克斯-施蒂纳，所有那些热爱大众的人中的黑兽，因为他们打算领导和驯化他们。一开始，他被描述为方托马斯的”必要参考”，因此，根据 Evangelisti 的说法，他也

说服语气，因为前者并不打算让被剥削者皈依，而是要激发他们，激怒他们，激起他们反对旧世界。

乍一看，这几乎是一个细微差别，但事实上，这是关于两个对立的观点，需要完全不同的实际一致性。当一个传道人诅咒主人，赞美奴隶时，他所做的不过是批评前者的行为，向后者对鞭子的反抗致敬。主人是邪恶的，因为他压迫；奴隶是好的，因为他忍耐。既然福音派拒绝奴隶的个人反抗，他们只被授予集体反抗，在同一时间一起反抗—这个时间被那些不爱”简化资料”的人无休止地推迟了—那么由此产生了什么？那就是奴隶们必须继续做好事，也就是忍气吞声，希望迟早有一天…。

另一方面，当非法主义者同时诅咒主人和奴隶时，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比较他们的责任，而是敦促后者立即改变他的生活，采取行动反对主人，因为非法主义者坚持认为，总是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来解放自己的枷锁。因为命令是可耻的，这是事实，但服从也是可耻的。因为在鞭子面前，宽容不是赞美，而是反抗。让自己被剥削的诚实工人，或让自己被统治的诚实选民，没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地方。令人钦佩的是反叛的能力，抛弃强加的社会角色，以便开始做自己；这种能力总是有机会表达自己。在利伯塔德（以及像他一样的无治主义者）对被剥削者允许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蔑视背后，总是有对他们可以做什么的热情。人们可能赞同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也可能不赞同，但说这是对被剥削者的实际建议，是对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的理论化，是一个白痴该有的反常行为，或是一个卑鄙小人该有的诽谤。伊万杰里斯蒂表明自己两者都是；例如，当他把资产阶级战争贩子和无治主义非法分子相提并论时，忘记了如果前者满足”对弱者的仇恨”，后者则满足对强者的仇恨。同样，在伊万格利斯蒂将埃米尔-亨利招入非法分子行列后，他不得不承认，当亨利宣布自己赞成”野蛮的反抗行为”时，他也指出，他的唯一目标是资产阶级。至于他的受害者，至少可以说，在传教士的眼里，他们的血必须比西班牙无治主义者所流的血更可怕。后来在1923年春天，15位同志在巴塞罗那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冲进猎人俱乐部—最反动的主子们惯用的退路，向在场的人开火。

在任何情况下，伊万格利斯蒂首先对法国的非法分子发起了谴责，他们被称为”波诺帮”而载入史册。撇开”波诺帮”这个事

误解

正如已经说过的，公民主义开始时是对所谓”代表权危机”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反应。这种反应的目的是通过新的代表形式来克服和治疗这一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作为政党和工会的自然继承者出现的，以恢复更激进和颠覆性的紧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所处的环境呈现出极其有趣的因素，因为它们有可能孕育着有利的机会。公民主义医生出现在政治废人处于痛苦之中的地方。仅仅是它的出现，就肯定地表明了行动的机会。事实上，在医生忙着开药的时候，难道不能利用这种混乱对这个病人实施健康的安乐死吗？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许多颠覆者决定介入这些斗争形势，意图利用这些场合，激化公民主义目标，超越他们，使他们面对自己的矛盾。但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也许已经被低估了。这方面的一个假设是对”沿途意外”这一古老理论的重新定位。即使一个运动是在改革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它也可以随时跳轨和改变方向。毕竟，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平庸是整个历史上革命的名片。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开始支持平庸的好理由。至于一路上的意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颠覆者往往是心甘情愿承受这些意外的人。这些颠覆者，疯狂地参加改革主义运动，目的是使其激进化，结果往往是自己改变了方向。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人适应事件，而不是试图通过坚持自己的想法（冒着留在”大众”边缘的风险）来强迫它们。不幸的是，这一点现在前所未有地跃然于我们眼前。抛开个人的叛乱，现在人们支持人民的直接民主，参加或多或少的大规模的政治示威，而自己过去曾呼吁别人放弃，在自己的倡议中接待自己过去鄙视的分离知识的学术专业人士。一个人不再为自己的质的差异而自豪，而是为自己的量的特性而自豪。一个人不再以挑起冲突为目的发起激进的批判；相反，他沉默褻瀆以寻求和谐。

在瓦尔苏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颠覆者终于没有追赶”普通人”的斗争，而是普通人与颠覆者一起进行斗争。”群众”的存在肯定让颠覆者有点头大，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每一种斗争形势下保持关键方面的必要性，目的是加强，但在瓦尔苏萨，这并

没有发生。相反，颠覆者允许一些概念性的尸体，如”人民”和”直接民主”，在其各种意识形态的掺杂下，重新被投入流通。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它是在单一法律制度下生活的意愿为特征的主体的集合体。地理因素不足以定义人民的概念，它需要同意的权利和利益共同体。人民是一种政治和历史身份，它可以获得故事和记忆，有权参加纪念活动、示威和大理石墓碑。人民是可见的、可说的，在其组织结构中，由其代表、其烈士和其英雄代表。它的神话被各种类型的当局所接受，或者它在几十年前就被自由主义者（至少是被那些不那么脑白质化的人）所抛弃，这不是偶然的。它在瓦尔苏萨无拘无束的高歌猛进，造成了民粹主义综合症立即出现的后果。一般来说，这个词被用来指任何基于以下前提的政治表述：美德存在于人民之中-被认为是一个同质的社会集合体，是积极的特定和永久价值的唯一代理人-以及其集体传统（瓦尔苏萨是游击队的土地……）。在民粹主义中，农村因素往往占主导地位，因为那些与土地、与山地保持联系的人，对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抱有某种怀疑和敌意。民粹主义是大公无私的。它排除了任何阶级冲突，因为它认为人民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倾向于在转型期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大都市和省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播，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凝聚的理由，同时也是警告和凝结的理由。每当看到广大社会阶层的迅速动员和现有机构渠道之外的强烈政治化时，民粹主义的公式就会复苏。对神话的再生力量的呼吁甚至潜伏在最清晰和最复杂的社会中，准备在斗争的时刻实现。而人民的神话是最吸引人的，同时也是最隐晦的，在权力斗争中是最没有根据的，也是最有作用的。

所有这些特点在瓦尔苏萨都非常明显，被参与其中的许多方面所利用，他们不想让具有一定潜力的总动员这一美味的机会逃脱。即使是无治主义者方面，也有一些人没有退缩，他们对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充满信心，这种民粹主义了解其杰出的理论家，并在民众集会中得到最佳表达。从瓦尔-苏萨开始，这种感觉已经蔓延开来，每个人都可以控制决定我们社会命运的决定：只要知道如何与他人讨论就够了。这种信念导致了直接民主的复兴，希腊意义上的政治，以及 agora 的神话-公民可以非正式地聚集在一起讨论、交流思想并参与到有益的关系中的公民空间，因为在这些民众大会上，他们将面对共同的问题，目的是以直接、面对面的方式达成协议。简而

好战的牺牲和死亡的本能，寻求把个人的要求（在他对自治的需要中）与摧毁专制社会的需要相协调。事实上，《自由》克服了个人造反和社会革命之间的错误二分法，强调前者只是后的一个时刻，当然不是对它的否定。造反只能从个人的具体紧张中产生，而这种紧张本身的扩大，只能导致社会解放的项目。对 Libertad 来说，无治主义并不在于脱离任何社会环境，生活在某个冰冷的象牙塔或某个幸福的社区小岛上，也不在于屈从于社会角色，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時刻拖延到最后，而是在于此时此刻作为无治主义者生活，没有任何让步，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反抗。而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造反和社会革命不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

这种生活观念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达成一致，这激怒了各种布道者，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继续做银行职员、大学教授、部门官僚或大型出版社的小弟的同时成为革命者，把改造现实的任务留给外部历史机制。正如利伯塔德本人所说”我们的生活是对弱者和骗子的侮辱，他们以一种从未付诸实践的想法为荣”。维克多-塞尔日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利伯塔德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发挥的魅力。”无治主义完全抓住了我们，因为它向我们要求一切，也向我们提供一切；生活中没有一个角落是它没有照亮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工会主义者，而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因此也不会改变生活：毕竟，一个人只需要阅读相应的报纸，经常去相应的咖啡馆。无治主义充满了矛盾，被各种倾向和次要倾向撕裂，它首先要求在行动和语言之间达成一致”。

既不是奴隶也不是主人（没有奴隶就没有主人）

根据福音书的说法，主人是创造奴隶的人。只有当那些命令者消失时，那些服从者也会消失。但只要主人存在，奴隶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低头，耐心等待死亡。相反，对于非法主义者来说，奴隶也创造了他们的主人。如果前者不再服从，后者就会像这样消失。这就是为什么非法主义者通常倾向于让自己失去布道者非常喜欢

非法分子，而不是传教士

艾默里奇的创造者的问题是所有灰色的、左派³激进分子的问题。他不明白，这些无治主义者没有时间耐心等待“伟大的黎明”的到来，等待本应解决社会问题使他们摆脱剥削的大规模革命的到来。他们不想听红衣教士的福音，根据这些福音，解放被刻在资本主义进程本身，构成它的快乐结局。他们对领导人没有信心，他们从自己的智慧高度，通过观察、测量、计算，得出了革命明天就会发生，而不是今天的不变结论。他们很着急，想在此刻活下来，而不仅仅是生存。第一个在法国强硬地、持续地嘲弄革命布道者的人是 Zo d' Axa，他是《L' Endehors》周刊的创建者，乔治-达里安、吕西安-笛卡尔、维克多-巴鲁坎、费利克斯-费内昂、贝尔纳-拉扎尔、圣-波尔-鲁、奥克塔夫-米尔波、特里斯坦-贝尔纳、埃米尔-维尔哈伦等作家在其中合作（想想可怜的埃万盖斯蒂，在他学术无知的时候，把 d' Axa 写为一个“二级普及者”）。受到法律制度的迫害，被指控为“恶棍协会”，阿克萨并没有颂扬未来人间天堂的美德，而是痛批当前社会地狱的缺陷，目的是煽动他的读者进行反抗。

在他之后，将轮到阿尔伯特-利伯塔德。但与 Zo d' Axa 不同的是，Zo d' Axa 基本上是个独行侠，而利伯塔德能够赋予他的行动以建设性的形式和社会影响，增加他的思想范围。Evangelisti 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那份“发行量相当大”的报纸成功地“赢得了一些大众部门的认可”。作为自由主义报刊的合作者，积极参加支持德雷福斯的鼓动，1902 年，利伯塔德是反军国主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并与帕拉夫-雅瓦勒一起创办了“人民的事业”，这些公开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有助于在巴黎不同地区开设一家书店和各种俱乐部。在这些倡议引起的情潮中，三年后他创办了《无治主义》周刊。在 7 月 14 日纪念日之际，这份报纸印刷并分发了十万份“权力的巴士底狱”的宣言。在开展反对社会秩序的狂热活动的同时，利伯塔德通常还组织宴会、舞会和乡村旅行，这是因为他把无治主义看作是“生活的乐趣”，而不是

³ 文字游戏。在意大利，“sinistro”的意思是左派和不祥的、不祥的、恶意的、诡异的。

言之，就是那些最松散、最悲哀的无治主义激进分子多年来所描述的“非国家公共领域”。

集会的希腊文是 ecclesia³，这当然不是偶然。如果宇宙中最完美的组织可以被称为上帝，那么政治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就得到了强调。不太明显的是它对那些打算从上到下颠覆这个世界的人所产生的吸引力量。导致男人和女人相信语言的诞生是为了促进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畸形的反常导致他们来到这些集体聚会，在那里他们辩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事务。这些事务在在场的人中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辩论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能力不会是平等的（那些知道得更多、说得更好的人在集会中占主导地位），少数人没有理由接受多数人的决定……所有这些只有在人们不常去 agora 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一旦人们踏上那里，也许是受到事件的刺激，旧的困惑就会消散；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有很好的“演说能力”，这种奇迹就会更容易发生。然而，仍有一些人继续认为，这种将个人团结成一个群体，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以分享的东西，使他们平等的努力是可憎的。因为它充满了虚伪性。同样的虚伪，在忽视了让古希腊人不停地讨论的奴隶之后，在清除了不值得成为人民的一部分的无定形和匿名的平民之后，现在准备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只有在放弃他们各自的世界-敏感的世界，没有超市和高速公路，但在梦想、思想、关系、话语和爱中丰富。

在政治理性和宗教信仰中，主导思想是平等来自于认同，来自于对一个世界观的共同坚持。我们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或社会的公民。相反的可能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出现过，但从未被考虑。人类的普遍和谐可能起源于个人的分裂被推到无限大。个人要么是平等的，当他们都是相同的，要么是都是不同的。在团结所有人的集会中，理性-逻辑斯-通过讨论被唤起。说话、推理、争论，这是问题像阳光下的雪一样融化的地方，冲突被解决，协议被达成。但要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突然发现我们都是兄弟，需要多少妥协，多少节制，多少现实主义？

因此，在彻底批判了人们可以回到社会变革科学的信念之后，在肯定了没有控制社会事件的规律之后，在驳斥了客观历史机制的幻想之后，在清除了阻碍自由意志的所有羁绊之后，在唱出了否定一

³ 这也意味着“教会”，因此，“教会”这个词。——英译者

切形式的计算的过剩之后，人们回到了过去，用手中的尺子来衡量所进行的步骤。参加活动的人被计算在内，收到的媒体报道被控制，对平衡的连续预测被做出。显然，那时的激情并不那么邪恶，欲望并不那么疯狂，利益并不那么遥远。

也不明白为什么直接民主，作为在叛乱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调解（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应该成为一种理想，在此刻与各种市长、地方当局和被幻灭的公民置于现场的政治家合作实现。直接民主是一个虚假的好主意，它与它的大姐头，广义上的民主一样，都是对形式的迷信主义。它认为，组织集体的方式先于讨论本身，而且这种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类型的问题上都是有效的。捍卫直接民主，作为“真正的”民主与“虚假的”代议制民主相抗衡，意味着相信当我们从压在我们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时，我们的真实本性才能最终被揭示。但是，从这些约束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一种转变，在这个过程结束时，我们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更好的是，我们将不再是这个基于统治和金钱的文明中的样子。未知的东西不能通过已知的路线到达，就像自由不能通过权威到达一样。最后，即使接受建立有效的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仍然会有反对意见：为什么少数人要适应多数人的愿望？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持续的、可怕的例外状态中。然而，这不是权力在面对自己的规则时颁布的法令—权利是主权者编造的一个纯粹的谎言，他不被认为与这个谎言相一致—而是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愿望时颁布的。它不是像一个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它不是说一个人想说的话。它不是按照一个人想要的方式行事。它不是爱一个人想爱的人。它是不得不日复一日地降低自己的身份，向那些将我们的梦想置于死地的暴政妥协。因为在这里，它不是关于胜利或失败（好战分子的典型痴迷），而是关于过一个人唯一可用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小小的姿态和普通的话语可以将人群和拥挤的街道维系在一起，但我们只能在自己之外寻求这些姿态、这些话语来满足对社区的新归属感吗？除非我们想给个人一张空白支票，只是为了以后让他们知道那其实是卫生纸。

颓废者、可怜虫的世界接触，与模棱两可的世界接触。中心老区的年轻工人或工匠与哈勒斯街区小巷里的皮条客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相当聪明的司机和机械师，一般来说，通过阶级精神和因为他们‘不受’偏见的影响，从老板那里偷取任何东西”。事实上，巴黎有一些街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风险”，主要是城市的北郊（Pantin、St.-Ouen、Aubervilliers 和 Clichy），许多职业小偷和扒手、诈骗犯和造假者住在那里，还有成千上万的无产者为了勉强糊口而被迫偶尔卖淫。当自己不是这个“暧昧世界”的一部分时，巴黎的无产者通常会同情它，并自然地敌视警察，而且他们根本不反对对自己进行小规模盗窃。

在邦诺和他的同志们进行的第一次抢劫之后，一家法国报纸立即宣称，巴黎警察需要增援，因为他们必须对付二十万名不法分子（在三百万人口中）。如果许多无产者欢迎无治主义者关于“个人报复”的论述，而不是让-格雷夫（或瓦莱里奥-伊万格里斯蒂）的道德，如果他们同情雅各布或邦诺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他们理解他们的来意。

然而，伊万格里斯蒂坚持认为，在无治主义非法分子那里，拒绝雇佣劳动已经成为对工人的蔑视，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变成了它的帮凶。所以非法主义者应该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划分取代了剥削的帮凶和反抗者之间的划分。Evangelisti 的整篇文章都在谴责这种“明确的简化”，这种“粗暴地废除所有分析性的细微差别”，因为它导致了“斗争的战略视角和中期的战术要求一样模糊”的罪恶。简而言之，瓦莱里奥-伊万盖斯蒂向我们保证，他的话不是一个前财政部官员在面对这些无治主义者时感到脊背发凉的话，而是一个习惯于观察“结构良好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图景”的同志的心声，并担心它不会被一个“简化的轮廓”所取代。为了革命的利益，不用说了。

的形象（有点像在哲学界，有人试图把萨德作为野蛮纳粹的另一个自我）。仿佛一个反抗社会的个人与一个醉心于权力的国家人员有什么共同之处。仿佛那些过去的无治主义者（但在作者的隐秘意图中，指的是少数现今的无治主义者）是一帮狂暴的疯子，渴望着鲜血，渴望着屠杀者。也许现在是时候用冷漠的沉默或欢快的笑声以外的东西来反对这个谎言了。Evangelisi 的文章—一个由错误、矛盾、诽谤组成的小文集，整个文章都有有趣的失误—为这样做提供了一个最佳时机。

打倒工作!

人们一再指出，历史最糟糕的敌人往往正是历史学家。与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不同，他们只限于叙述历史。他们的研究对象—其他人的冒险生活—有时会成为一面镜子，他们在里面看到自己生活的平庸。一面镜子要打破，它的景象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意识到他们自己只是沉思的被动角色，他们对那些以第一人称生活和直接行动的人进行报复。因此，伊万格利斯蒂，这个历史专业的毕业生，这个多产的历史主题的散文作者，这个历史档案馆的馆长，把那些遥远的无治主义者的历史神秘化也就不足为奇。不清楚埃米尔-亨利与非法主义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词是用来指用于获取金钱的一系列法律之外的做法：盗窃、抢劫、骗局、造假。把无治主义者推向非法主义的不是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妄想或道德沦丧，而是对雇佣劳动的拒绝。

社会对我们最严重的勒索是在工作和饿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在工作、寻找工作和工作后的休息中消磨掉了。有多少梦想破灭了，有多少激情萎缩了，有多少希望落空了，有多少欲望在每天可怕的工作谴责中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直是最野蛮的人生判决。一些无治主义者，与其为了自己的工资和别人的利益而低头弯腰，不如以另一种方式获得生活所需的金钱。而他们的这种选择也得到了许多其他无产者的认同和践行。傲慢的伊万吉利斯蒂小心翼翼地不去回忆，在当时，巴黎到处都是靠智慧生活的人，例如，蒙马特的大多数无产者。正如维克多-塞尔日后来回忆说”当时巴黎工人阶级的一个特点是，它与暴发户接触，即与广大的非正规者、

《全国团结互助公约》摘录

在 Venuas-Rome NO-TAV 大篷车结束时，各委员会、网络、运动和团体于 2006 年 7 月 14 日在罗马市的 Protomoteca 会议室聚集在一起，达成共同协议，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全国网络和全国团结互助协议，以便在我们国家确认。

公民有权获得预防性信息，并积极参与每一项想要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运作的干预措施，分享共同的物品（水、空气、土地、能源）。

使用促进和消费系统，珍惜领土资源，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商品及人员的流动，并且不以剥削为基础，特别是对世界南部的剥削。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暂停进行大型公共工程和能源工厂的本地化 [... 这里我没有列出具体的能源工厂类型，因为我在任何一本字典里都找不到大部分意大利语单词的翻译...]，这既是因为缺乏国家能源计划，也是为了防止少数人的商业逻辑吞噬多数人的资源。

取消《目标法》、《环境代理法》、《中央释法法》、焚烧炉的绿色证书和对《能源设计法》进行彻底修改的紧迫性。

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由每个参与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全国协调会（有网站和电子邮件），我们邀请所有其他委员会、网络、运动和团体一起加入这个团结和互助的全国公约。

你把这叫生活？

黎明时分起床。迅速去工作，使用一些快速的移动手段；换句话说，把自己关在一个或多或少宽敞的地方，通常缺乏空气。坐在电脑前，没有休息地打字，以便抄写信件，如果你必须用手写，有一半的信件甚至都写不出来。或者操作一些机械装置，制造总是相同的物体。或者永远不要离开一个需要确保其运动或需要监测其功能的发动机几步远。或者，最后，站在织布机前不断重复相同的手势，相同的动作，机械地，自动地。而这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娱乐，没有任何气氛的变化。每一天都是如此！你把这叫做生活？

你把这叫做生活？

生产！还在生产！总是在生产！就像昨天，就像前天。就像明天，如果疾病或死亡没有袭击你自己。生产什么？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但其多余的部分你不允许讨论。复杂的物体，你手中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低的一部分。如此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制造它所需的所有阶段。生产？不知道你的产品的目的地。没有能力拒绝为你不喜欢的人生产，没有能力表现出最起码的个人主动性。生产：快速，迅速。作为一个生产工具，被刺激，被鞭策，被超载，被磨损到完全枯竭的地步，到了你不能再承受的地步。

而你把这叫做生活？

早上开始猎取客户。追求，抓住”好顾客”。从地铁上跳入汽车，从汽车上跳入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跳入有轨电车。一天做50次访问。花大力气高估自己的商品，声嘶力竭地贬低别人的商品。傍晚时分回家，过度兴奋、厌倦、不安，让你周围的人都不开心，缺乏任何内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对更好的道德存在的冲动。

你把这叫做生活？

在牢房的四壁中苦苦挣扎。感受未知的未来，通过亲情或风险共同体，将你与你自己的或那些你至少认为是自己的人分开。如果

小说，不久前，甚至可以在超市货架上的面包和卫生纸之间找到。Evangelisti 为他们献上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出现在一本选集中，旨在向 Marcel Allain 和 Pierre Souvestre 的想象力所创造的文学人物，恐怖之王方托马斯致敬。”方托马斯和非法分子”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它是伊万格里斯蒂激情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将奇幻小说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在此有必要说，由《方托马斯》唤起的奇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非法主义无治主义者进行政治批判的一个借口。在构成这篇文字的六个段落中，只有第一段是关于 Allain 的和 Souvestre 的。其余的文字赋予了这位左翼激进分子在面对无治主义叛乱时的梦魇以身体，他决心不在档案的灰尘中闷死。

Evangelisti 的论点可以迅速地总结出来。方托马斯，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罪犯，是 20 世纪初在法国产生的；他受到非法主义无治主义者的启发，这些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犯罪，有时是无偿的”，在任何社会斗争的背景之外，为了满足他们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这种非法主义经历了早期的一代，在这一代中，残酷的暴力事件是有限的（拉瓦绍尔和亨利），而且，无论如何，仍然与阶级观点相联系，但后来遭受了堕落，导致它捍卫对被剥削者本身的无差别的暴力，正如在理论上在 Libertad 的著作中和在实践中在”Bonnot 帮”的行动中所见证的。非法主义思想将完全被限制在无治主义运动的一个边缘领域，在其他国家的敌人中找不到确认，在那里”革命进程不断被设想为群众行动，即使引发革命的任务可能被归于一个狭隘的先锋队”。这种以只关心自己安逸的个人的名义盲目推崇暴力的做法，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最糟糕的推理，因为”资产阶级被打造成国家，恰恰是那些开创了到那时为止最广泛和最不加区别的屠杀的时代的人。他们将是集体体现非法主义理想的人，就像对弱者的仇恨和对道德义务的绝对自由一样”。结论是令人难忘的。”非法主义从一个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变成了统治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血腥”。

你不能说伊万杰里斯蒂的论点很有创意。他们只是重复了对非法主义无治主义者最经常的诅咒，这些诅咒是由更反动的无治主义者和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敌视”无产阶级”的傲慢的知识分子投掷的。所有这些个人的猛烈敌人和人民的忠实朋友，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传播波诺作为野蛮资产阶级的另一个自我

邦诺和福音派

幸存者一直困扰着社会运动。被认为是失败的战斗的幸存者，被分解的意识形态的幸存者，未实现的乌托邦的幸存者，遗憾的人物，他们把自己的个人失败当作历史上的失败来介绍，目的是为他们的类苦难找到一些公共理由。众所周知，既然幸存者的生活已经结束，就有必要考虑如何面对生存，他们中的一些人忍不住要把自己奉献给文学。如果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昨天没有为革命服务，那么至少让他们今天为过日子服务吧！

瓦莱里奥-伊万格里斯蒂（Valerio Evangelisti）就是这些好人中的一个，他是著名的科幻作家，也是审问者艾默里奇这个人物的创造者。而这还不是全部。他还策划了“记忆工程：公社”，是博洛尼亚新左派历史档案馆” Marco Pezzi ” 的主席，是《世界外交》¹的合作者，也是《Carmilla》杂志（“文学、想象力和反对派文化”）的编辑主任。有一件小事在啃噬着所有这些有激进渴望的作家，那就是试图将利益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但说实话，我们必须承认他身上有一个不可否认的质的飞跃。与那些在放弃了对天堂的攻击后又去攻击销售排行榜的人不同，伊万格里斯蒂在学术生涯和财政部的职能部门之间交替工作。

和他的同事皮诺-卡库奇²，前无治主义革命者一样，伊万格里斯蒂出生在艾米利亚的首都（博洛尼亚），那里有着不光彩的记录，孕育了整整一代的“创造性”休养生息者（从比弗到卢瑟-布利塞特到海伦娜-维勒纳）。像卡库奇一样，他对二十世纪初的法国非法主义无治主义者，即” Bonnot 帮” 产生了兴趣。卡库奇写了一本

¹ 一份法语期刊，是当今欧洲当前左翼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² In ogni caso nessun rimorso 的作者，翻译成英文为《没有一丝悔意》（Christiebooks），一部关于邦诺帮的小说。不幸的是，美国的一些人似乎把它当作非小说类的帐户，尽管作者打算把它当作小说，而英语出版商也在宣传它。

被判刑，感觉到你的生命正在从你身边逃走，你无法再做任何事情来决定它。这种情况持续数月，甚至整整数年。不再有力量抗争。你不过是一个数字，一个嘲笑，一块湿抹布，一个被监管、被监视、被窥视、被利用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比犯罪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你他妈把这叫做生活？

穿着制服。在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里，无休止地重复杀害他人的行为。在年轻的时候，在阳刚之气充分爆发的时候，被关在巨大的建筑里，在确定的时间里离开和进入。吃饭、走路、起床、睡觉，在固定的时间做任何事，也不做任何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学习如何处理旨在从其他你完全不知道的人那里夺走生命的工具。为了让你准备好在某一天倒下，被来自远方的一些射弹杀死。训练你自己去死，或造成死亡，成为特权者、强者、垄断者、囤积者手中的机器人工具。当你没有特权，没有权力，没有任何东西的拥有者。

你他妈把这叫做生活？

不能学习，不能爱，不能隐居，不能随心所欲地挥霍时间。在阳光普照、鲜花飘香的时候，不得不呆在家里。当北风吹得冰冷，雪打在你的窗玻璃上时，你不能走向正午的太阳；当天气变得闷热，田野里的草干枯时，也不能走向北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撞到法律、边界、道德、惯例、规则、法官、车间、监狱、军营，撞到保护、维持、捍卫的男女制服，撞到一种令人厌恶、阻碍个人扩张的事物秩序。而你们—你们这些热爱”生命”的人，”进步”的香客，你们这些转动”文明”之车车轮的人？-

你们把这玩意叫做生活？

[埃米尔-阿曼德]

安全如死

”那些能够放弃基本自由以获得一点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也不配享有安全。”

- 本杰明·富兰克林

这是一个被谈论得很多的问题，但其诊断却很简单。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结论都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

每天的新闻都向我们展示了在伏击、强奸和谋杀现场收集的大量血液。血腥的事件被疯狂地描述和拍摄下来，使我们已经被日常礼节所削弱的脊背感到可怕的颤抖。

看着别人的不幸不再是一种安慰。我们不能够因为逃过一劫而松一口气。它是一场噩梦，因为这些不幸似乎压在屏幕上，以便把自己扔到我们的客厅地毯上。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这些新闻广播的主角，现在只剩下死亡？在恐怖的笼罩下，我们开始把门锁上三道，不再和邻居说话，也不再在夜里出门。恐慌蔓延，因为以下的肯定是普遍的：缺乏安全是我们时代的祸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天堂之门将为我们打开。

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对暴力的真正增加感到有些困惑。面对明确的要求，”专家”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与过去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统计数据的飞跃是不同记账标准的结果。但也是知名度的问题。它是这样运作的。政治阶层将安全问题置于其所有干预措施的中心。记者们像往常一样迎合他们的主人，重复政治家的关注，并加强他们的关注，用新闻项目来说明他们。并不缺乏可供报道的新闻。如果这些故事不被归入第十五页的一个段落，它们就会不成比例地扩大，直到成为典范。对政治家来说，剩下的就是对它们进行评论，戏就演完了。”你看到了吗，我们的担忧不仅仅是合理的，它们是无可争议的。这确实是一个安全问题！”

无产者的特殊荣誉在于直截了当地接受所有以他的名义被判处强迫劳动的谎言：责任、祖国等等。他接受了这些谎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提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受害者变成了帮凶。不幸的人谈论国旗，捶胸顿足，摘下帽子，向空中吐痰。

- 我是一个诚实的工人。

唾液总是落在他的脸上。

[Zo d' Axa]

诚实的劳动者

正是广大被剥削者无法治愈的麻木不仁，造就了剥削者日益增长的合理野心。

煤矿和金矿的国王们，如果担心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奴隶的辞职使他们的权威神圣化。他们的权力不再需要诉诸神权，那是装饰性的废话；他们的主权通过民众的同意而合法化了。由狂热的爱国主义追随、宣言式的平庸或沉默的默许组成的工人公民投票，确保了雇主的帝国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这项工作的工匠是确定的。

无论是在矿场还是在工厂，诚实的工人，那只羊，已经给羊群带来了疥癣。

一个反老板的理想颠覆了人们的本能。星期天的大衣，说话的政客，投票……是希望取代了一切。可憎的日常工作既没有唤起仇恨，也没有唤起怨恨。伟大的工人党鄙视那些拙劣地赚取老板授予的钱的游手好闲者。

他们热衷于工作。

他们为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感到骄傲。

无论他们的手指如何变形，枷锁对他们的头颅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随着马具在他们头皮上的不断摩擦，不甘心、懦弱和尊重的肿块已经膨胀起来。自负的老工人们挥舞着他们的证书：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四十年！你会听到他们在谈论这些。你会听到他们在院子里乞讨面包时谈论这些。

- 可怜吧，先生或夫人，一个老残疾人，一个优秀的工人，一个优秀的爱国者，一个参加过战争的老军士……请怜悯，先生或夫人。

天气很冷，窗户仍然关着。这位老人不明白……

教育人民！那还需要什么？他们的苦难没有教会他们什么。只要有富人和穷人，后者就会按部就班地给自己上轭。工人的脊柱已经习惯了束缚。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唯一不抗议的是奴隶。

归根结底，如果不是为了在人民中散布恐怖，促使他们要求他们的代表采取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太大的意义。针对谁？为什么？”针对那些一旦成为聚光灯下的犯罪巨头的小罪犯。

不言而喻，小罪犯并不完全是困扰我们生活的首要问题。相当多的问题使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时代处于危险之中。地球受到生态失衡的威胁，裁员和重组笼罩着工作场所，我们的房子被银行盗窃，我们的健康被我们吃的和呼吸的毒药所威胁。我们的整个生存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威胁（不要说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及其不可预见的附带影响），其后果比在公共汽车上偷钱包要严重得多。可能发生的不幸是如此之多，我们的日子在不稳定和痛苦的标志下度过，以至于认为小罪犯是社会不景气的原因是完全疯狂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重复说到我们晕头转向，说侵略就在拐角处埋伏着呢？很简单。因为国家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伟大的保护者，让人们围绕着它集会，并向它求助于错误的矫正者。抢劫犯、抢钱的人、毒贩子、强奸犯或杀人犯—随机的或顽固的、真实的或假定的、本地的或外国的—不是对环境破坏、工作损失、金融破坏、食品掺假、工作场所事故、轰炸平民、折磨世界的饥荒或任何其他重大社会问题负责的人，有必要揭露那些对所有这些事件最直接负责的人吗？在公共场合对偷鸡贼的惩罚是为国家及其雇佣的杀手们服务的，它转移了人们对鲨鱼私下觅食的普遍关注。一种担忧驱赶着另一种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机构会散布一种归咎于他人的恐慌，不断地喂养它并以各种方式增加它。

因此，对安全的担忧为政治阶层提供了另一个优势，使其有理由采取民众自己要求的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以获得，首先，”惩罚的确定性”。（对谁来说？但这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一个因可能被偷窃而感到恐惧的民众会对秩序力量的增加表示赞赏。一个被移民犯罪所吓倒的人对 CPTs（临时居住中心）表示欢迎和欣慰。一个被发现有人闯入他们家的可能性吓坏了的人，对不断扩大的监控网络表示欢迎，等等。但是，以打击少数轻罪犯的名义颁布的规定，特别是在打击许多潜在的叛乱分子时将会派上用场。比起轻微的犯罪行为，真正需要镇压的危险是社会冲突。对不安全感的政治利用是镇压性法律的强大力量。我们所处的恐怖气氛不是可恨的社会条件的自然结果。它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把满足的城市居民滑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警察制度。国家将公共安全问题上与”微

观犯罪”相提并论，目的是为了强加其解决方案。公共安全，也就是说，警察。

所有的安全措施都是对个人自由的真实攻击，如果没有真正的思想警察行动，旨在强加安全是自由的保障而不是对自由的预防性否定的观念，就不可能如此轻率地采取。因此，疾病和治疗已经被创造出来，在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联盟中调和了安全和自由。一个荒谬的联盟，在两个矛盾的概念之间是不可能的，就像水和火一样，它们不能保持接触而不互相溶解。

安全的建筑工地建在自由的坟墓上。安全的目标是远离所有的危险，而自由的实践则相反，需要对每一个危险进行挑战。使安全”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把某些东西锁起来的行为，这并非偶然。典型的例子是将野生动物从丛林中抓出来关在笼子里。动物园管理者向我们保证，通过这种方式，动物被从丛林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变得安全。在笼子里，它不会有被猎人射杀或被野蛮的野兽撕碎的危险。好吧，这种动物当然是安全的，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它的自由。众所周知：当一个人躲避危险时，他并没有生活，只是勉强保留了生命；因为只有去迎接危险，他才能完整地生活。

因此，安全和自由是完全不相容的。

”控制得越多，我们就越安全，”蠢货说。然后补充说：“视频监控摄像头很有用，因为在他们眼皮底下什么都不会发生。”骇人听闻的表达方式，是对老大哥无条件的爱的症状。但谁会想过一种受控制的生活，在那里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以完全蒙蔽心灵为代价，人们才能愉快地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所跋涉的情感沙漠。自由是自我决定，是对任何可能性的选择，是风险，是对未知事物的挑战，不能在玻璃钟下养尊处优。

但在我们的时代，对一个”诚实”的人所要求的第一个品质恰恰是他以透明的方式生活。一个透明的人在他的公共或私人生活中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没有什么可沉默的，因此，没有什么可害怕别人监视他。在透明的名义下，每一次入侵都是合理的，任何保守秘密的意愿都是有罪的。令人好奇的是，曾经被尊重和谨慎包围的个人私生活，现在却被怀疑地盯着。通过逻辑和修辞上的杂技，保护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行为。驱逐私人生活，很明显，允许其揭发的东西-调查-被奉为首要价值。如果是这样，那么为此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就不会也不能受到质疑。窃听的辩护！

获得足够的睡眠。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的时间是在午夜之后，所以要晚睡。

让最激进的想法和超出这些想法的东西流动起来，以对抗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雇佣劳动停止时经常发生。

如果你想保持成功，一定要拒绝第一个工作机会。

想停止。利用一切可以加强你的欲望：奴役、缺乏刺激和工资是对所有人的健康的危险，特别是对创造力的危险。

彻底停止。因为工人只要有一点消费欲望就会增加工作的剂量，所以半途而废是无效的。经验表明，一下子突然停止，比逐步停止要容易。

选择合适的时机。最好是马上。目前的时期，其生活条件是可互换的苦难，特别有利。在一个假期之后，当需求经常自发消失时，你可以决定不再开始。

让自己沉浸在有利的氛围中。与你同住的人、朋友或工作同事同时停下来，在心理上互相帮助是有效的。通常，在同一时间，这允许不生活在恐惧的气氛中（在工作戒毒期间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气氛）。让你认识的人知道你正在戒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摆脱诱惑。让工作和它的附件（汽车、电视、闹钟）从你的环境中消失。不再戴表或在家里放钟。避免进入你习惯于用你喜欢的活动占据空闲时间的情况（闲逛、沉闷的读物、电影、购物）。避免公共交通和某些庆典活动，如政治会议，在这些活动中，温顺的放弃是习惯性的。

通过肯定你停止工作的决定和积极坚持预期的好处来影响你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头脑。不要犹豫，每天大声重复几次：“我选择停止工作，我的健康每天都在改善”，或任何其他你选择的积极公式。

深呼吸，以便放松并为你的神经系统提供氧气。实际上，神经细胞消耗的氧气是身体其他部位细胞的四倍，这意味着它们因缺乏空气而特别受到损害。在你感到需要呼吸的时候，慢慢地深呼吸三或四次，适当地排空你的肺部。强烈建议离开和改变气氛。

拒绝所有的改善，以使你的视线只停留在整体上。不要拐弯抹角。激发热情，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天。寻找刺激物（挣脱所有的社会约束）以及与你的前老板们进行激烈的、曲折的争论。在两餐之间喝酒，以激活消除森严的气氛。优先考虑最健康的活动—你直接参与的活动—以及自然的、重要的需求，这些需求富于快乐（爱），以及富于满足感的充实时刻（离开、聚会）。为了避免无产阶级排毒期间经常出现的紧张，小睡是很重要的。可以增加某些颠覆性的读物，以应对排毒治疗期间破坏系统的特别重要的需要。减少压力、恐惧和犹豫，以避免体重下降。

起初，这种对透明度的要求是为了遏制那些掌权者的滥用行为。要求公职人员的生活透明，要求那些肩负重任的人透明，有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功能。他们必须对自己管理“公共事物”的方式做出回答，也就是说，把他们放在一个不能滥用特权的位置上。但相反的要求—普通人在掌握权力的人眼里应该是透明的—比人们想象的更可怕。在交换“信息”和相互控制的借口下，为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不惜一切代价的透明度本身就已经产生了令人不快的后果。人的某些方面自然会躲过每一次不谨慎的注视。一个人的亲密关系，与他的性品味，就是其中之一。曾几何时，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的人被指责为沉湎于造谣生事，并受到不赞同的目光。现在，造谣被重新命名为“八卦”，被认为是给原本平淡无奇的谈话增添色彩的调料。这个世界的沉闷已经把私人的恶习变成了公共的美德。

但谁会停下来反思这种影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房子已经变成了看守所¹，这是事实，但这是对思想自由下令进行休克治疗的一个禁忌问题。为了冲走这种总能受到秘密保护的自由，整堆人都被点燃了。对自由的要求是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自由尸体葬礼前的悼词。

而我们没有在行刑队面前反抗，而是低下了头。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都在试用期的社会里，每天都勤奋地回去在辞职登记表上签字。因为面对绝对的自由，没有限制和界限，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媒体震耳欲聋的过度报道，使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敌人，刺激我们选择社会控制这种较小的罪恶；但也因为我们共同参与了堕落—我们感到有些宽慰。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视让我们对警察、联邦特工和法官的善良感到放心—他们是无数电视节目中的英雄—但它有多少次邀请我们直接通过钥匙孔进行窥探。所谓的“真人秀”已经产生了一种效果，使透明的生活理念在所有人面前展开，并定期受到审判、惩罚和奖励，成为人们熟悉和规范的。

对破坏自由裁量权的抗议遇到了一个已经成为经典的障碍：“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你就不用害怕控制”。令人震惊的，警察式的推理，再次使用逻辑上的颠倒，使自由裁量权成为一种恶习，插手成为一种美德。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变得像一个监狱，在那里

¹ 在意大利语中，有一句谚语：“像看门人一样八卦”。

他们采集每个人的指纹，在那里你走过无数的金属探测器，在那里你被电子眼观察，在那里无罪推定已经让位于有罪推定。

由安全意识形态滋生的恐怖气氛还有一个后果。如果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全，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因此，没有受害者，只有有罪的人和潜在的人。如果我想从我的邻居那里得到保护，而我的邻居也想从我这里得到保护，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都是潜在的侵略者，给予我们自由是危险的。

我们都成了嫌疑人，因为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自由，我们可能会做什么。国家按照这种逻辑一路走来，并宣称它有权惩罚这种威胁，即使是最无害的表现形式—甚至是预防性地镇压它。至少在早期，人们坚持认为，当个人把他的越轨意图付诸实践时，他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任何人都可以梦想杀人，只是你不能不受惩罚（当然，除非你穿着制服）。西方的民主文明喜欢把它对其他文明的优越性塞进我们的喉咙。这些其他文明被评判为蒙昧主义，因为它们不能保证其中的人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当然，只是谎话连篇的宣传，但那至少要伪装成真实的样子。今天，压制已经摆脱了任何尴尬的负担，，大家都很清楚，仅仅是越轨的梦想，仅仅是思想的偏差，就足以吸引司法系统的铁拳。举个例子？定期将手铐铐在从互联网上下载”儿童色情”图像的人身上的逮捕令。无论这种行为多么可鄙，多么值得批评，多么令人憎恶，事实是，这些人不是因为虐待任何未成年人而被定罪，而是因为在自己家里看照片而被定罪。距离公开焚烧萨德的作品还有多长时间？另一个即将发生的例子是去年2月12日因调查所谓的”新 BR”（红色旅）而被捕者的一些朋友的遭遇。他们在张贴海报时被警察巡逻队拦住，并被带去逮捕。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一张海报可以表达一种思想。此外，这些海报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是煽动武装斗争，而是对反恐战争的平视。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对反军国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进行突击检查？

个人的想法、欲望和冲动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同时也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了威胁。由此产生了正在蔓延的内战气氛：夜间宵禁、武装士兵的巡逻、路障。这就像对一个假想敌宣战一样，这个假想敌并不存在，但可能是我们。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任何人都不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如果每个罪犯都是国家的敌人，那么就在进行一场针对个人的战争。现在，罪犯的概念和敌

如何停止工作的十个技巧

- 也许对于流浪者、无家可归者、无业游民、不务正业者来说是
这样。

- 但是，简而言之-我回答说，相当愤怒-有相当多的情况…… 例
如，疾病、失业，让你没有自由，除了饿得呱呱叫。

- 错了，先生-他语重心长地说-诚实的人不需要担心这种情况的
发生。例如，在我的家乡，没有失业，而你所说的人是那些不善于
利用自由的人。

- 对不起，但你们这些不停地谈论自由的人，你们是做什么的？

- 我，先生，是一名狱警。

人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前者被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
后者则不是。敌人不能得到减刑，对他的惩罚也不能协商。没有人
假装想让她改过自新。她被摧毁了。对付他，一切都被允许。战争
是警察行动，而警察行动是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被认为是要消灭的内部敌人。尊重合法
性。但对这个现代偶像的祈祷并不能保护你免于危险，也许除了神
的愤怒的危险。然而，在一个无神论者身上，一个可怕的疑问出现
了。为什么法律本身应该是善的同义词？在纳粹主义下，对犹太人的
迫害是合法的。死刑、作为逼供手段的酷刑、核弹头的制造，这些
在许多国家都是合法的……。一个行为的合法性仅仅表示它符合
法律规定的內容，即符合作为其作者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没有告
诉我们关于该行为的价值、意义和后果。因此，法制文化完全导致
了通过服从来实现无知，而服从甚至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再是一种
美德了（同时继续成为暴君的甜蜜梦想）。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方面。要瞥见高举的合法性所推向的深渊，
只需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实施诸如强奸这样的行为？
我们拒绝这种行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与
我们的想法和感觉相悖，还是因为法律条文中存在着禁止和惩罚这
种行为的条款？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动机可以说是道德的。在
第二种情况下，它是法律的。坚持认为人类应该遵循国家的合法性，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道德，意味着宣布个人不可能为自己确定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在自由意志屈服于权威意志之后，刑法典成为
一个不再有良知的世界的良知。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被认为是缺乏
智慧、感情迟钝、对痛苦不敏感的人-一个需要被关在笼子里、被
控制、被压制的野蛮的野兽。这是为了使道德不受合法性的影响
而要付出的代价。

一个将其成员视为敌人并委托权威机构压制其思想和行动的社会，
一个迅速牺牲一切自由以换取一丝安全的社会，一个将善视为
服从法律、将恶视为违反法律的社会，最终只能成为极权主义。你
还能如何描述一个被国家置于缓刑制度下的社会，而这个国家被
授予每一种武器和每一种警察方法来处理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
微粒？正如汉娜-阿伦特所坚持的，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可以是极
权主义。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不仅把尊重法律，而且把思考这
些法律要求你思考的东西作为必要的公民义务。简单地说，2001
年在

热那亚打破银行窗户的叛乱分子并不是唯一的罪犯；那些没有阻止或谴责他们而”精神上参与”的人也是罪犯。这种社会秩序并不局限于压制对自己的敌意，还包括冷漠：爱它是一种责任，谁不执行它，谁就会受到迫害。

不幸的是，我们心中有一个盲点，使我们无法将现代世界的极权主义与上世纪上半叶的那种极权主义相比较。仿佛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沉重性证明了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轻盈性。仿佛包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铁丝网与包围当今从关塔那摩到临时居住中心（CTPs）的集中营的铁丝网是不同的规格。但是，任何人如果在没有毒气室的情况下没有停下来，不相信一个政权的无情是由一个特别可怕的方面决定的，就不能不掌握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同样的平庸之恶，同样的个人异化，同样的通过意识形态和恐怖的结合而失去我。今天，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从西到东都在统治着，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质疑。这种无所不在的现象正在成为它的担忧。只要资本主义有一个敌人，它就有个替罪羊，可以卸下所有的责任（这件事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相互发生的）。但现在，如果世界发现自己处于深渊的边缘，该怪谁呢？

最终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世界—一个巨大的超市，吐出塑料包裹的商品—根本没有增加幸福、和平或平等。敌人现在变成了任何抗议这个世界的人，也就是说，可能是所有人。它并不等待愤怒的爆发。它把当前社会关系的恐怖归结为个人的自由，突然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使我们在他人眼中都是可疑的，在恐惧中孤立我们，在穷人中挑起战争，以化解社会战争。而且它采取了镇压这种威胁的必要的立法和警察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所谓的安全漂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预防性的叛乱行动。

自由万岁

-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对共和国有不好的评价。难道你不欣赏它所提供的足够多的自由吗？

- 毋庸置疑，但是…

- 我也是，先生。我完全了解我的完全自由。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公路工人。在其他政权中，我将立即被同化为奴隶，并可能成为某个乡村绅士的财产。相反，先生，尽管我出身贫寒，但我生来就是一个自由公民。我没有被看作是负担的野兽，而是自由选择了我的职业。或者更好的是，我父亲为我选择了本应靠我的工作生活的老板。先生，从物质意义上讲，我是相当可怜的；我的工资很荒唐，开支也相当大。但当晚上来临的时候，我看着镜子说：“这是一个自由人”，这让我感到自豪。18岁时，我自由地加入了我最喜欢的军队，我非常感谢这种自由，它使我能够在外国执行任务并获得这枚勋章，这是我一生的荣誉。

- 我不会告诉你在那些任务中所获得的自由。报纸上说得够多了。

- 从那时起，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祝福共和国。现在，我是一个受薪雇员，我的工资并不高，但我知道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拥有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尊严。在其他时代，在帝国的统治下，你会被一帮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贵族所欺骗。但今天我们有自由选择自己服从谁，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们，我们可以每四年更换一次。你不欣赏这种优势吗？

- 非常欣赏。

- 我们有说话、写作、喝酒、抽烟的自由，甚至有喝醉的自由，显然，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除外，这是自由公民自由接受的契约。

- 是的，但你不觉得某些自由不那么令人愉快吗？例如，如果你付不起房租，可以睡在桥下的自由…

他做了一个愤慨的手势。